

祀”，“王”谓武王。武王十五年，即灭商之第三年。

以上三篇，次序相承，记事相属，均应归之武王。《序》篇归之文王，说明早在其书编订之时，“王”字已误作“二”或误作“三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北大学历史系

《郁离子》成书当在明初

程念祺

《郁离子》是元末明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刘基的代表作。刘基门生徐一夔为《郁离子》作序，开首即称：“《郁离子》者，诚意伯刘公在元季所著之书也。”《诚意伯文集·行状》曰：“……公居青田山中，乃著《郁离子》。”《明史·刘基传》曰：“基遂弃官还青田，著《郁离子》以见志。”这些说法，往往使人们以为此书是刘基在元末弃官隐居家乡青田时写完的。亦即刘基于1360年出任朱元璋的谋士时已经完成《郁离子》。然而笔者再三研读《郁离子》，发现其中有许多文字，直接涉及明初历史，兹举几例：

1.《郁离子·论相》篇曰：“楚王患其令尹芈吕臣之不能，欲去之，访于宜申。宜申曰‘未可。’王曰：‘何故？’宜申曰：‘令尹楚相也。国之大事，莫大乎置相，弗可轻也。今王欲去其相，必先择夫间之者，有乃可耳！’王蹙然曰：‘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国，不惟诸大夫及国人知之，鬼神亦实知之。大夫独以为未可，寡人惑焉。’宜申曰：‘不然。臣之里有巨室，梁蠹且压，将

易之。召匠尔，匠尔曰：梁实蠹不可以不易，然必先得材焉，不则未可也。其人不能堪，乃召他匠，束群小木以易之。其年冬十有一月，大雨雪，梁折而屋圯。令尹虽不能，而承其祖父之余，国人与之素矣。而楚国之新臣弱，未有间者，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。”此与《明史·刘基传》载朱元璋与刘基论李善长事，形同翻版，其曰：“初，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。基言：‘善长勋旧，能调和诸将。’太祖曰：‘是数欲害君，君乃为之地耶？吾行相君矣。’基顿首曰：‘是如易柱，须得大木，若束小木为之，且立覆。’及善长罢，帝欲相杨宪，宪素善基，基力言不可，曰：‘宪有相才无相器。夫宰相者，持心如水，以义理为权衡，而已无与者也，宪则不然。’帝问汪广洋，曰：‘此褊浅殆甚于杨宪。’又问胡惟庸，曰：‘譬之驾，俱其僨辕也。’帝曰：‘吾之相，诚无逾先生。’基曰：‘臣疾恶太甚，又不耐繁剧，为之且孤上恩。天下何患无才，惟明主悉心求之，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。’”对照来看，《论相》中的“令尹虽不能，而承其祖父之余，国人与之素矣”以及“必先得材焉，不则未可”和“束群小木以易之”等句，恰合《刘基传》中的“善长勋旧，能调和诸将”，以及“是如易柱，须得大木，若束小木为之，且立覆”等句之符节。

2.《郁离子·枸橼》篇曰：“夫木产于土，有土斯有木，于是乎果实生焉。果实之所产不惟吴，王不遍索，而独求之吴，吾恐枸橼之日至，而终无适王口者也。”这是在批评朱元璋对江南地区的重赋政策，将会造成泽竭而鱼尽的局面。

3.《郁离子·种树喻》篇曰：“今君之用人也，不待其老成，至于不克负荷而辄以法戕之，栋梁之材尽矣。”朱元璋用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以“毋拘资格”为前提，然对不称职者，即行诛戮。

而且，《明史·刘基传》把刘基与朱元璋论李善长及论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，并在一起叙述。今按《诚意的刘公行状》，

论李善长事，系于洪武元年（1368）之前，论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事，系于洪武元年之后，洪武三年七月之前。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十三，明确地把论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事，系于洪武二年十月。据此，至少可以断定《郁离子》之写作，于洪武二年时仍在继续进行。又据《郁离子·枯荷履雪》篇，曰：“郁离子归，绝口不谭世事。”而刘基于元末弃官归乡隐居时，仍纵论天下大事，并且安集流民，“稍为部署”（《明史·刘基传》），以保一方。然读此《枯荷履雪》篇，便觉其当年之慷慨英气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当是在洪武四年刘基“归老于乡”（《明史·刘基传》）以后的情形。

那么，为什么刘基的后人及门生，要把《郁离子》的成书时间提前到元末呢？很可能是由于此书虽为设喻取譬，但其批评明初政治的倾向十分明显，特别是刘基本人在为政宽严的问题上，已与朱元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，朱元璋对刘基所写的东西定会十分敏感。徐一夔为此书作序，时在洪武十九年，为了自己和刘基的后人，当然要有所顾忌。

综上所述，刘基写作《郁离子》的时间至少持续到明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而非完成于元末。故而《郁离子》一书，对于了解刘基在明初的政治活动亦具有一定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

读《清代版刻一隅》

刘 心 明

黄裳先生的《清代版刻一隅》问世了，这是黄裳先生继《榆下说书》、《银鱼集》、《珠还记幸》、《翠墨集》、《前尘梦影新录》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。此书由齐鲁书社出版，共收书